

亚布力

企业思想家系列丛书
Business Thinkers Series



中国企业家论坛◎编著

让企业有

VI

思想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亚布力 
企业思想家系列丛书
Business Thinkers Series

特别鸣谢 **吴君玉** 对本书的鼎力支持

中国企业家论坛 © 编著

让企业有 思想 VI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芙蓉王《让企业有思想》系列丛书的第6部，书中文章以会议讨论的形式呈现，用最真实、贴切的语言详细记录了亚布力群体近100位企业家的思想轨迹，来追寻中国本土企业家最丰富的思想世界。

金融和地产，是任何时期都绕不开的话题。近3年来众企业家、学者在亚布力会议上就金融话题的讨论，一方面呈现了众企业家、学者不同时段的思想与见解，另一方面也通过众企业家的切身感受折射出这3年来中国经济的状况以及他们在面对这一现状时的不同表现，或乐观，或悲观，或观望。回过头来看，他们的观点与现实或许并不相符，但这不是我们将之呈现于读者眼前的目的所在，企业家们面对世事变迁所采取的直面现实、深入思考、积极应对的处世态度才是我们希望读者看到的，从而通过这些进一步领悟中国企业家精神。

责任编辑：陈晶晶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让企业有思想Ⅵ/中国企业家论坛编著. —北京：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4.1

ISBN 978-7-5130-2357-3

I. ①让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企业管理—经验—中国 IV. ①F279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41545号

让企业有思想Ⅵ

RANG QIYE YOU SIXIANG VI

中国企业家论坛 编著

出版发行：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

网 址：<http://www.ipph.cn>

发行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101/8102

责编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391

印 刷：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版 次：2014年1月第1版

字 数：226千字

ISBN 978-7-5130-2357-3

邮 编：100088

邮 箱：bjb@cnipr.com

传 真：010-82005070/82000893

责编邮箱：shiny-chjj@163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印 张：13.5

印 次：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7.50元

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序言

用企业家的声音去引导市场预期

信心比黄金更重要。为了经济的稳定运行，我们需要更客观、更可信的预期，我想，企业家的预期应该受到更多重视。

当今的世界不仅生产过剩，还信息过剩。人们往往困惑于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存真去伪，困惑于如何区分截然不同的观点与预期。面对信息量已经很充分的企业家们，我不想对今天的经济问题谈我的看法，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我们都十分关心、困惑的关于明天的问题，它就是“预期”。

预期一直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早期社会，人类对未来就充满了好奇，同时也心怀敬畏与不安，因此一些可以预知未来的预言家们受到推崇、膜拜，如旧约中的先知、推演周易的文王姬昌、创作《诸世纪》的诺查丹玛斯，等等。尽管随着文明与技术的进步，人类对自然界与历史运行规律的认知不断增加，也开始重新审视或质疑所谓的先知和大预言家们超长期的预言，但现代社会仍高度依赖于预期。预期成为经济活动参与主体进行投资、生产、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，特别是随着金融深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，预期有时甚至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。

其实，经济学家们早已发现预期对经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。凯恩斯在其《通论》中明确提出了预期的作用，并将之作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。20世纪70年代，以卢卡斯为首的学者们创立了理性预期学派，并进一步强调了预期对于经济活动参与者

行为的影响，甚至提出了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无效的假说，颠覆了凯恩斯理论。而卢卡斯本人也因此获得了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且此后还有三位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。2002年，由于将心理学成功运用到预期理论中，行为经济学先驱卡尼曼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他论证了很多看似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非理性的，比如一些投资人面临亏损时不是“风险厌恶”者，而变成“风险追求”者。预期学派频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，预期在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。

在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，由于消费、生产行为受到需求、订单以及沉没成本的制约，具有一定刚性和时滞性，预期变动通常不会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。但近些年来，随着金融、房地产、大宗商品等行业的大发展，资金流动速度加快，预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显著放大，各国政府开始重视预期管理。政策制定转向公开透明，政策目标转向稳定和单一。

由于政策决定权在社会资源分配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，政府行为对市场预期的影响很大。因此，在正常情况下，成熟市场中的宏观政策力求保持明确稳定，政策制定者则谨言慎行，避免市场出现理解偏差，以尽量减小对经济活动的影响，从而维护市场的有效自主运行。只有在突发事件导致市场出现“集体非理性”时，政府才会通过市场干预和预期引导来纠正市场失灵。但困难的是，在互联网时代，信息传播飞快，当错误信息得到纠正时，实际上已经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不良后果。因此，社会一直期盼着准确、清晰的预期。

做到准确很难，做到清晰亦不易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以言辞含混不清闻名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，那么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。”当然，格林斯潘含混不清、充满暗示的语言，目的是为了尽量不影响到市场的预期，但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困扰。他与女友谈了12年恋爱，期间曾经两次求婚，但典型的格氏语言让他的女朋友一直没弄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，直到他恢复正常语言表达才求婚成功。在互联网时代，这种语体还能适用吗？

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除注重经济总量和增速等指标之外，应重视市场预期对经济的影响，尤其要关注预期与经济基本面严重背离的状况出现。当今世界，预期不再是“虚拟”的，因为如果缺乏对未来的良好预期，消费者不敢放开手脚消费；投资者不敢轻易投资，就会使潜在投资受到抑制；出现资金单向异常流动，要素价

格剧烈波动；一些出口厂商甚至不敢再接订单，实体经济将直接或间接受到严重影响。资本市场是最易“被预期”的对象，我国股票市场连续两三年“熊冠全球”，银行股估值跌至历史低位，与我国的人民币有效汇率上升、经济数据及公司财务指标良好严重背离。2013年初至8月5日，我国A股下跌8.9%，而美国道指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分别上涨了19.14%和22.3%。近日的市场又被一些预期引导，大批资金从新兴市场撤出，流向几周前还被绝大多数人描绘成“低迷之极”的欧洲，市场真的变化如此之快吗？

但有意思的是，中国虽然总体上缺乏预期管理，却并不缺少“预言家”。有些人敢想、敢讲、敢预测，认为预言不是谣言，讲错了不需要付出代价；有些人屡预屡错，但屡败屡战；有些人缺乏起码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精神，对经济数据狡猾操纵，随心所“预”，信口开河。一些人看透真相，深知“当预言家远比章鱼保罗作出预测要容易”，认为经济或市场走向无非涨、平、跌，只要死盯一个趋势，不论多头或空头，总能等到对的时候。因此，有些预言家在春天的时候就预言冬天将来临，但如果相信他们的预言，穿上棉袄，恐难熬过漫长的夏天。2006年，当时预言“两年后发生金融危机”的鲁比尼就是一个永远的空头，这点连他自己都不否认。对中国唱空的预期更是屡见不鲜，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主席、著名经济学家斯蒂芬·罗奇（Stephen Roach）最近就指出，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有怀疑态度的市场专家们再次开始了“中国崩溃论”大合唱——这是每隔几年就会让经济和政治评论员们兴奋一段时间的顽疾。没人在意过去几十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中国怀疑论者再次提出，“这次的情况真的不同了”。在这些所谓的“崩溃论”一次次破产后，却没有人再去追问当初那些所谓的“预言家”，而这些预言家们可能又正在埋头准备着下一个“预言”了。

更有一类预言家是为了商业利益。无论是唱空中国，引导市场预期，或是唱空市场，从中攫取暴利，都怀有其明确的获利“预期”。不负责任的胡乱预期和带有明显动机的预期会成为市场噪音，扭曲市场行为，形成非理性的“羊群效应”，加剧经济波动。这种功利性极强的所谓“预期”蒙蔽了市场对经济真实情况的判断，扭曲了现实。但遗憾的是，因为受扭曲预期的引导，我们往往难以看见事实真相。

信心比黄金更重要。为了经济的稳定运行，我们需要更客观、更可信的预期，我想，企业家的预期应该受到更多重视。

企业家已成为社会中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一个中坚群体，应该主动在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引导市场预期，而不是成为沉默的大多数。过去的 20 多年间，改革赋予了我国企业家们难得的机遇，但是困难重重，企业家们披荆斩棘、摸着石头过河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了我国经济体系中一股中坚力量，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。但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比较低调，或者只专注于自己的企业和行业，不愿意对经济动向发表意见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活跃的企业家或组织，像这个亚布力企业家论坛，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
正所谓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与前面所讲的各类“预言家”相比，企业家的预期更贴近实际，更真实可靠。一是企业家扎根市场，直接面对消费者和原材料供应商，是最接地气的群体，因此应该最能切准经济脉搏，其预期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实体经济趋向；二是伴之企业家预期的都是真金白银的投资，所以来不得虚假，会更客观、可靠；三是与那些终年只在岸上旁观的预言家不同，企业家一直在市场中游泳，对外部水温和风浪的变化感触更直接迅速，而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，企业家们还练就了高度的敏锐性和非凡的判断力，所以企业家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判断应该比较准确。

企业家群体的经验和智慧是一笔宝贵的财富，如果挖掘出来，必将成为引导市场行为的重要预期指标。企业家有能力、也有责任发出更多、更强、更清晰的声音，引导市场形成合理预期，因为一个被扭曲的市场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投资行为是有害的，也是企业家们所不愿看到的。亚布力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，我建议借助这个平台发布企业家预期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。比如，由各位企业家从自己行业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走向，形成一个综合的企业家预期；或者设立亚布力企业家信心指数，编制一些指标，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进行调查，形成一系列信心指数。

我想，通过企业家预期和企业家信心指数，市场可以更客观、真实地解读中国经济，对未来形成合理预期并据此调整经济行为，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。当然，更有说服力的是经济本身的持续、均衡发展，这也寄期望于企业家们的共同努力！

姜建清

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

目 录

CONTENTS

I / 序言

用企业家的声音去引导市场预期

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

什么决定 202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 / 3

如何面对中国未来的“低增长时代” / 19

中国经济是否面临失速风险 / 35

开发中国大市场——中国经济的真正潜力 / 48

金融体制如何改革

65 / “金融新政”的回眸和展望

75 / 大变局时代的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业发展趋势

85 / 危机之后的金融市场教训

95 / 应对通胀之“虎”

115 / 温州怎么了——解析中小企业融资困局

129 / 金融回归实体

中国地产业未来命运几何

“限购”和中国房地产未来趋势 / 147

改革开放 30 年：房地产行业的展望与思考 / 156

大变局时代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趋势 / 170

为何功过是非都在此 / 179

大城市之困：交通与环境 / 192

207 / 后记



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

什么决定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

如何面对中国未来的“低增长时代”

中国经济是否面临失速风险

开发中国大市场——中国经济的真正潜力

什么决定 202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

(主持人: 刘晓光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)

「通常的说法是, 尽管 2012 年的中国经济很“紧张”, 但真正的严冬却是在 2013 年, 而且这个严冬可能会很冷, 因为短、中、长三个周期的谷底在这一年前后发生了叠加。本宏观经济分论坛将讨论 2013 年最悲观的情形: 什么决定 2020 年经济倍增?」



● 讨 论 嘉 宾

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

毛振华 中诚信集团创始人董事长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

胡祖六 著名经济学家与金融专家

张利平 瑞士信贷集团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

陈浩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

朱 宁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

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

刘晓光：我们这场叫作“什么决定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”。从现在数到2020年还有8年时间，按照题目来理解，又能理解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是什么？这个题目是一个眼前比较大的题目，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题目。第一轮请每个人做2~3分钟的发言，来回答什么决定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，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是什么？

毛振华：经济总量翻一番问题不大。

我抛砖引玉。我觉得2020年经济总量翻一番这个没有太大问题。尽管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折点，遇到很多困难，但从长期增长来看，还是有一些新的因素。尽管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出口、劳动力红利，包括过去第一轮改革的消失，发生了衰退，甚至是逆转，但是中国经济还有一些新的机遇。一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在需求，我是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这条线索对过去的增长做一个分析。像邓小平时期、20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利用的是国际优势、西方走过的超前消费、个人信贷这样一个需求。从供给来看，特别是我们赶上了这一次新的技术革命，就是通信电子方面的改革，使我们的经济有了很快的增长，但这次新技术革命因2008年的经济危机而结束了。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做了一个分析，200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顶点，按一般规律来讲，2008年以后就该往下走，后来由于金融危机，政府又加大了力量打基础。

刘晓光：咱们的4万亿也管用。

毛振华：其实后来听说不是4万亿，有40万亿。尽管2008年以来很多大的经

济政策都值得商榷，但是中国经济还是客观存在着一些有利的因素。

第一，是国内消费的潜在需求。因为中国的消费水平、消费率不高，提高消费率、消费水平是有客观基础的。把这个潜在需求激发出来是可以实现的，尽管是一个缺点，但还是一个机会——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机会。

第二，是城镇化。现在看来是一个巨大的空缺，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需求，也是供给方面的一个优势。

第三，除了这两个因素，我们还有有利因素——一些产业发展不充分，如服务业。我讲的还不是新兴产业，而是传统的服务产业，也可理解为一个初步发达国家拥有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还不够，因此还有很大的机会。

这些因素加起来，中国经济具有潜在的有利因素，除非我们走了太臭的棋、布了太臭的局。我们的目标是 2020 年之前就能够成为第一大供给国，当然也要考虑人民币和美元的关系。

刘晓光：下面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张文魁所长。欢迎！

张文魁：重振全要素生产率。

老实说，两三分钟讲不完，如果让我讲一句结论，就是要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才可能实现一个比较高的增长。所以我需要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，从增长核算角度来说，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两部分：一部分是来自要素投入，另外一部分来自生产要素的提高。过去 30 年，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于要素投入，20 世纪 90 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的贡献率曾经达到 5 个百分点以上，但是现在已经下降到每年 2 点几个百分点。我们越来越依靠要素投入，但实际上要素投入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，所以为了实现比较高的一个增长率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如果 2020 年比 2010 年 GDP 翻一番，必须要开辟、重振全要素生产率才可以达到每年 7 点几个百分点的一个增长速度。这是我的一个简单陈述。

刘晓光：您认为我们主要在生产效率上有问题？

张文魁：对，我们如果不能重振全要素生产率，要想实现 7 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就很难。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，储蓄率会下降，而我们又严重地依赖投资，但是我们的储蓄率不足以支持投资，所以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最后肯定是高通胀。

关于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预测，很多图表和模型并不靠谱，因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，经济结构很难按照预定的轨道来调整。这种情况下进行模型测算，很多就需



依靠供给端和需求端来预测。从人均收入来看，中国离前沿距离还非常远，只相当于美国的 20%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，但是我想跟大家强调的是，前沿距离和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即将接近敏感点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结果是，人均收入达到 1.1 万国际元是一个临界点。很多人说，我们离经济前沿距离非常远，即使按照 8% 的速度增长，

也还需要 20 年。但按照国际的实证研究来看，尽管我们离经济前沿距离还非常远，但是我刚才说的由几个敏感点而带来的高增长也会结束。

刘晓光：实际上就是一个外延和一个内涵。

张文魁：我们快接近于外延追赶技术的前沿点了，这才能够使我们有可能每年实现 7% 以上的增长。

刘晓光：您的结论是如果仅靠外延到了极限，现在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。

张文魁：很多追赶型的国家研究发现储蓄率会下降，下降就不能支持很高的投资率，我们是占 49 个百分点，如果非要这样，那只能是通货膨胀。

刘晓光：关于体制的因素影响我们效率的相对数这个问题您研究过没有？

张文魁：经济学的研究过去几年是对资源错配的研究，为什么有的国家增长快，有的增长慢？还有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有些行业增长快，有些行业增长慢？资源错配会拉低实际增长率，我们国家的这种体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资源错配，所以资源错配也会导致配置效率的降低，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。要重振全要素生产率，就要通过包括改变中国的体制来扭转资源错配，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全面的提高。

刘晓光：有人说，如果消除我们体制上的弊端，改革可能会提高 50% 的效率，或者是 3 倍的效率？

张文魁：根据我们的研究，这个观点，可能夸大了改革的作用。国外的一名教授做了非常好的研究。他有一个大概测算，如果进行模拟，假定国有部门资源导致的资源错配能纠正，大概会提高 1~2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，不足以说 50% 或者是 3 倍。

3 倍是多少？这是不可能的。1~2 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是有可能的。

张利平：2013 年全球经济焦点将回归正轨。我首先非冒犯地说，对于“2012 年的经济很紧张，2013 年是真正的严冬”的说法，我持不同看法。

刘晓光：为什么？

张利平：大家都知道前 5 年，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混乱和经济衰退，这 5 年已经过去了。前 5 年当中所有投资者和公司、政府都忙于关注中央银行如何注资，货币如何干涉，体制上的风险有多大，比如大家也担心欧元的崩溃——若整个欧洲经济倒闭，则政府的主权债将还不出来，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全部过去了。2013 年全球的经济焦点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，会注重公司的盈利、公司的投资，会注重基本的经济活动要素，这是我的观点。

刘晓光：您认为坏的周期过去了？

张利平：已经平稳了，但也不是说没有风险。比如从欧美角度来说，美国经济相对已经看到复苏的迹象，但是风险还在执行层面。比如说国会和政府之间、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协调不好的话会使美国的经济走回去。欧洲经济今后 1~2 年、2~3 年的复苏在于德国的新政府。德国当然会重选总理，女总理默克尔会相对弱势一点，但是凭借德国的力量和欧洲央行的协调，如果协调好，欧洲的经济会走出去的。关于中国的宏观经济，2013 年仍然会有比较高速的增长，因为中国经济如果快速地下来，不仅是在拖全球经济的后腿，且中国将面临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问题。

刘晓光：凭什么高增长和继续增长？

张利平：这就讲到正题“202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”，刚才毛总讲的我是赞同的，总量翻一番是没有问题的，我很简单地回答什么来决定翻一番，四个字——“市场经济”。昨天吴敬琏教授的发言引用了外国经济学家的一句话，“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市场经济”，我非常赞同这句话。我为什么强调中国经济 202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？在前 5 年中国政府的干预很多，中国经济在前 2 年还是靠中国政府的力量——加大投资，政府的投资非常大，但是 2013 年一季度中国私营经济的投资还是不敢动。如果一个国家完全靠国有经济、政府支撑的话，这是没有办法翻的，而且是不能长期持久的。

刘晓光：您的意思是靠政府维持的状况是达不到翻一番的，只有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能够翻一番？

张利平：对，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，我们必须真正走市场经济之路，实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模式。我们要做的，第一是必须打破国有银行和国企垄断，这是在翻一番方面要做的。第二是利率必须要开放。第三是对私营企业要开放服务业，而且要减税，企业税要大量削减。政府有太多的税收收入，收入加大以后非常容易主导经济，所以又回到计划经济。市场经济的力量是一只无形之手，中国经济要翻一番仍然要靠四个字——“市场经济”。

刘晓光：胡祖六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，请他来谈谈。

胡祖六：春天不远。这场专题的命题就包含一个短期和对截至 2020 年未来 8 年的长期判断。短期的观点我完全同意利平的，长期的观点我同意文魁的，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说 2013 年依然是更加严冬。过去的 2012 年我们侥幸过关，其实 2012 年是充满风险，充满挑战的，可以说内外交困，四面楚歌。内外交困就是美国经济复苏不明确，所以中国的外需出口非常不好，内需也不够好。2009 年我们过度的刺激导致猛刹车，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，也引起了晓光很多的担心，房地产可能是真正的严冬。如果房地产有严冬，那是 2012 年，现在是早春二月，已经转暖了。

刘晓光：我称房地产是冬天里有春天。

胡祖六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钢铁行业、制造业、整个金融业包括地方融资平台也有很大的风险，所以房地产投资、基础设施投资、消费、出口全部都不景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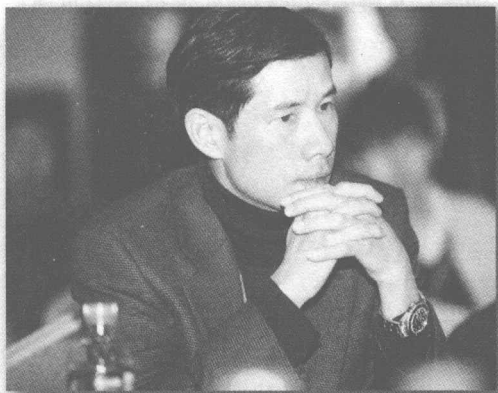
刘晓光：您认为 2012 年是最危险的？

胡祖六：对，而且还要加上一个政治不明朗。比如说十八大之前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新的版本，让市场、投资者都在猜测之中。幸好现在大的风险、不确定性慢慢地被化解、消除了，经济的很多信息指标都处于稳定回暖的迹象。当然不是说 2013 年就坦途荡荡，非常顺利，但是对每一个行业、每一个企业家、政府宏观经济决策部门来说，与 2012 年相比，那是天壤之别。比如说股市，对中国老百姓的信心反应很灵敏，尽管不是国民经济最好的“晴雨表”，但是非常好的反映投资者信心的“晴雨表”，这也说明中国很多的普通老百姓、投资者对经济的前景非常担忧。所以关于短期，我同意利平的观点。

2020 年经济总量翻一番肯定会达到，但是靠什么？靠全要素生产率。2012 年劳工的投入对 GDP 的贡献率是半个百分点到 1 个百分点，资本投入的贡献是 7 个百分

点。过去 30 年，我们经过好几次经济拉动的成长，只要资本的投入对 GDP 的贡献率超过 5%，即使我们能够做到储蓄率不下降，我们通过供给还能够维持高投资率，一定会造成很多风险，宏观经济不稳定，所以是低于 5%。比较审慎地加起来，平均按价格是 3% 的贡献率，这是比较有确定性的。加起来我们才 3.5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，我们要翻一番国民收入和经济总量收入至少是 7%，那还有 3% 在哪里？这个就靠生产率。

当然，回顾历史我们也很乐观，比如说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，新改革和国企改革，我们的 TFP 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 3.9%，那是没问题的，最高达到 5% 以上，但关键是要维持 8 年很不容易。在东亚历史上，比如日本从 1960 年国民收入倍增以后，最后平均生产率也就 2 点多一点，中国香港地区、



中国台湾地区也就是 2 点几，韩国是低于 2 点几，新加坡还要低。尽管要复制东亚的模式，但还是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。靠生产率，怎么提高生产率？这就跟刚才问利平的问题有关系，经济学有三大因素：第一是人力资本，第二是技术进步，第三是制度因素。人力资本主要是靠人的因素，现在生育率下降了，每个人的生产率更高；技术进步要靠研发、创新。制度包括法制、公平竞争、税收制度、个人所得税、企业所得税、增值税的透明和腐败问题——要减少腐败。中国如果要大力投资人力资本，鼓励创新，使制度更加便于公平竞争，就需要改革。

毛振华：把钱给穷人消费。

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是几十年前的分析方法。我也做过分析，就是从总供给方面来进行分析。那个方法太老套了，只要是学经济学的大家都懂。核心的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里面关于改革、创新、人力资本，在未来的群势里面并不构成一个真正主流，真正的主流是怎么来启动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。国内消费需求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指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，不是他的愿望，也不是他的欲望，涉及他是否有钱。